



冯英子

我所走过的道路



冯英子

# 我所走过的道路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 刘振华

封面设计 郇文龙

**我所走过的道路**

冯英子著

---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.75 插页6 字数178,000 印数1—2,000

1986年8月第1版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---

统一书号：7103·1324

定价：1.45元



作者近影

## 前 言

这个集子里所收的，其实是一组散文。

但这些散文却记录了我在各个时期、各个不同的新闻工作岗位上的经历，因此我把它叫作走过的道路。

同许多饱学之士相比，我其实只是一个不很合格的新闻记者。我出生于江苏的昆山，父母都是文盲，自己只读过五年小学。因为过于贫困，十一、二岁就出外谋生了，而且一直生活在社会的下层。十八岁开始进入报社，从记者到编辑，走的是一条不值得提倡的“个人奋斗”的道路。我不大愿意谈过去，也很少去想过去。

这几年来，因为有些地方的邀约，才写下一点过去的见闻。如头一篇《古镇同里忆当年》，就是应同里镇人民政府所约而写的；第二篇关于昆山的，也是应昆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所约而写。其他也是如此，一经催促，仓促成篇，写过算数。但是，写的虽仅一耳一目，一口一鼻，加起来时却大体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全貌了。这个人生活于我们的世界之

中，而世界又在不断的运动和发展，一个人的脚步，反映了世界在某一时期、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中的经历，可以为研究这个时代历史的人提供一些原始的、但却是真实的材料。我终于把这些文章依时间的前后串连起来成为一个集子，原意也在于此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在新闻工作岗位上的时间，已有五十二个年头了。我没有其他新闻界大师那样的幸运，一生办一、二家报纸，几十年磨一剑而卓然有成，我却是长时期在打游击，常常是凳子还没有坐热，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就站起来走了。我一生经历了二十多家大大小小的报纸，有的只是偶然客串一下，来去匆匆；有的却也颇费自己的心血，为之披荆斩棘，鞠躬尽瘁。虽都是“草台班”儿，不足与京报朝报并驾齐驱，但心血所在，想起来总是历历如在目前，有些回忆文章饱含着自己的酸辛和感情，其故也在此。

有几篇文章特别要讲一下。一篇是《不尽长江滚滚来》，是写对范长江同志的怀念。长江逝世之后，我写过几篇对他的怀念文章，这篇最长，也最详细。象我这样的人，在年青时代，求温饱是第一大事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“鸿鹄之志”的。我既无学历文凭，又乏乡戚世谊，虽勉强地动动笔，写点东西，毕竟浅薄得很。倘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，传奇性地结识了长江，那么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，自己也是怀疑的。我走过的道路，是长江所指引，是长江所开辟。对他的知遇之感，提携之德，耿耿难忘。我收入这篇文章，就想说明我所走过的道路，同长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还有一篇《把报纸办到敌后去》，这是我1938年12

月发表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上的一篇文章，原名《建立地方报纸和敌后报纸》，这是结合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，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建议，我主张用轻骑兵的形式，多办地方报纸，多办敌后报纸，使报纸从大城市走向全国，转入敌后，动员更多的人民群众，壮大抗战的队伍。在全国解放以前，我整个新闻工作的经历，也就是在这样“打游击”中度过。正因为长期为之身体力行，就不免有敝帚自珍之感，也把它收到这里。

这里所收的文章，绝大部分都已发表过，没有发表过的就是最后的三篇，一篇讲《新闻日报》，一篇讲《新民晚报》，一篇讲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的工作、生活。我在《新闻日报》工作近七年，坦率的说，这个报是我第一次参加“阵地战”的报纸，就是说从“游击队”转到“正规军”了，但我写它的经历却很短很短，其中当然有别的原因，看来有的还没有到发表的时候，我想以后倘有机会，再加补充未晚。《新民晚报》这一篇，只写了十年动乱，这十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最不幸的、最艰难的十年，发生在《新民晚报》的故事，其他报社大致也差不多。本文所记，旨在提供一些历史的侧影，使人看到那场“史无前例”的运动，在上海新闻界是怎样进行的，也使人永远不要忘记这场浩劫的破坏作用。

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”，时代的动荡，生活的变化，这里提到的许多师友，不少已作古人，每想到他们时，常为之潸然泪下。即使活着的朋友，自1957年以来，也鲜于往来的。我在《六家〈力报〉十年艰辛》中提到的潘乃光同志，悠悠几十寒暑，我不知道他的生死存亡。我们过去并

不相识，只是一个偶然的会，走到一起来了。但他却不顾自身的危险，把我从牢中换出来。这种精神，在现在某些人看来是不能想象的。说实话，几十年来，他的声容笑貌，一直在我左右，鞭策我前进，鼓舞我工作，使我记住一个新闻工作者应当负起的责任。这本集子的出版，既看看自己走过的道路，也是向活着的师友们汇报。

特别要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，他们鼓励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，帮我出版。我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，是一个知识分子摸索、探求的过程，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缩影吧。

我把这些文章呈献于读者之前，等待审阅。

1985年3月于上海



# 目 录

前言.....	( 1 )
古镇同里忆当年.....	( 1 )
从《昆南报》到《新昆日报》.....	( 11 )
吴门忆旧.....	( 18 )
从《苏州明报》到《大公报》.....	( 31 )
不尽长江滚滚来.....	( 44 )
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历程.....	( 61 )
重庆的斗争.....	( 75 )
把报纸办到敌后去.....	( 95 )
国新社时的鄂中历险.....	( 102 )
六家《力报》十年艰辛.....	( 112 )
《正中日报》的插曲.....	( 132 )
《前方日报》的风风雨雨.....	( 137 )
《中国晨报》始末.....	( 154 )
《中国日报》和《新中华日报》.....	( 172 )
《大江南报》的前因后果.....	( 181 )
《文汇报》的艰难岁月.....	( 193 )
一条电讯的来历.....	( 205 )
《周末报》的来龙去脉.....	( 212 )
《新闻日报》的春秋.....	( 226 )
《新民晚报》廿五年.....	( 233 )

## 古镇同里忆当年

我七岁那年，随母亲到了吴江的同里镇，到十二岁离开同里出去作学徒，在同里一共住了五、六个年头。

这五、六年，是一个人最美好的童年，从家庭开始走进学校，也从学校开始走进社会，虽然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，但有些印象是难于忘却的。同里镇人民政府给我来信，希望写一点当时的回忆。我出身微贱，多作鄙事，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东西。不过历史总是历史，倘能有助于历史的回忆，也不妨抛砖引玉，因此陆续写了以下这些。

我初到同里是1922年。原先我在上海纪王庙的纪王小学读过一年人手足刀尺，到了同里之后，第一件事是要找个学校读书，那时同里只有小学，最出名的是同川小学，其次有泰来小学、二铭小学、丽则小学。二铭和丽则都在西弄，前者是私立学校，后者是女子学校，两校虽然隔着一道围墙，但是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。我上的是二铭小学，虽然距住处稍远，但可以半费优待。

二铭小学的校长叫费质夫，号道基，这是一位非常和蔼可爱的老人。他非常欢喜学生，有时身边还带着桔红糕之类的糖果，每个学生分上一颗尝尝，有时学生围着他拔他头上的白发，他也乐呵呵的，他自己也教书，替我们上“修身课”，我到三、四年级时，他还在每天下午教我们念《幼学琼林》和《古文观止》，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，如《说岳全传》、《海公大红袍》等等，我之知道岳飞、海瑞，倒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学校中有好几位老师，教语文(那时叫国文)的老师叫王绍基，个子很高，样子既严肃而又严厉，我印象中似乎没有看见他笑过。有一次天下雨，我看见他在皮鞋外面又穿了一双鞋子，觉得很奇怪，过后才知道这就是套鞋。教体操和英文的老师叫何念椿，何先生是费校长的女婿，他穿着西装，走起路来一跳一跳的，大家觉得很有趣。还有一位教图画的老师姓宋，家住在陆家埭，记得有一年我考了第二名，得的奖品是一把折扇，画了一幅《晚凉洗马图》，就是宋先生的手笔。

费校长独力办这个学校，象我这样的学生又只交半费，因此学校的经费非常困难。他筹款的办法，一是请求吴江县教育局的辅助，他常常为此事写信给一个叫赵自权的督学，请他帮助；二是把学校改成临时剧场，请草台班来演出，为学校筹款。每到演出时，学校就放假，但我们却可以看白戏，他为了应付我们这些学生，特别在后座辟出一些地方，让学生看戏，但我们也常常不受限制，爬到前面的座位上去。

费校长同时是个民主主义的革命者，在北伐军到达同里之前，他就同他们有联系了。他写给赵自权的信中，也有谈同里形势的，看来就是暗通消息了。北伐军到同里之后，他高兴得很，出了一个题目叫我们做作文，我在作文中用“鸡犬不惊，草木无犯”这样的句子描写北伐军的来到，他看后在我的作文上加了不少密圈，表示鼓励。在这个学校里，我到现在还记得几个儿时的同学，有一个叫沈根仁，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端正，费校长常常叫他代笔抄信，他给赵自权的信，多半是沈根仁抄写的，沈根仁后来在一家米行里做学徒，我们还通过信，有一个叫任家澄，他的家就住在太平桥堍，他读书非常用功，后来听说他是升了学，到吴江去读中学了。有一个叫周金泉，他的家在太平桥附近开一个熟食店，出售酱肉、酱鸭。有两个姓吕的，是竹行埭上开穀香村糖果店的小开，后来大概就在自己的店中克绍箕裘了。有一个叫王炳熊，他家里开个印花布店，他们店里有各种刻着花纹的纸张，印花的时候，把纸张和白布迭在一起，刷上一种涂料，然后放在染缸中染，染好晒干后把涂料抖掉，就成为花布了。我认为染布是一种了不起的艺术，不过王炳熊没有继续这个职业，后来到了苏州阊门外一家糖果店做学徒去了。住在竹行埭或者后来在竹行埭商店中做学徒的，还有郑光裕、黄元吉、顾其昌、安世民、程世英、姜世民。住在富观桥附近，家中开竹行的叫顾镜清，在三元桥盐公堂里，有三个同学叫柴庆有、柴庆年、柴庆祥，可惜这些儿时同学，一出校门，各奔东西，大家没有任何来往，更谈不上什么关系了。有一个小小的插曲：十年动乱时期，我在上海新闻出

版“五七干校”接受“改造”，同连队有一个朋友，小时候也曾  
在同里，他认识柴庆祥，说柴现在在某出版社搞财务工作，  
也在这个“五七干校”，我忽然大发思古之幽情，要他带我去  
找柴庆祥，不料我还没有去找他，就得到消息，说他在干校  
投河自杀了。那时这种事情并不是什么新闻，我也只能自叹  
“缘慳一面”罢了。

大概是我读三、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开始在同里做小堂名  
了。

我初到同里，住在三元桥的胡家白场，后来搬到了北埭  
街，北埭的对面叫漆字圩，彼此之间隔着一条河。在漆字圩  
有一个唱堂名的班子，叫凤鸣堂，堂名在当时是豪门权贵在  
婚丧喜庆时用的演奏班子，大抵有七、八个人一班，演奏时  
还搭了一座台，那种台很象旧式的大床，不过比床还要大一  
点，四周镶以雕花的木板，装着彩灯，挂着流苏，演唱时演  
员们围着坐在台内，用乐器的用乐器，拍曲子的拍曲子。后  
来为了适应迎亲、送丧等等的需要，另外抽出几个年轻的跟  
着沿途吹打，成为一种仪仗队，这种堂名一般六个人一班，  
而且因为是年轻人，有的还是娃娃，所以大家叫它作小堂  
名。

凤鸣堂也有一班小堂名，他们都是堂名的学徒，但人数  
却不满六个，因此有生意而缺人的时候，常叫我去凑数，我  
不会用任何乐器，他们给了我一对磬子，在奏乐的时候，只  
要敲响磬子就行了。好在这种演奏是在行进中举行的，人家  
只是为了看热闹，也没有人来管你演奏的质量，因而我这个  
小小的南郭先生，倒是很容易滥竽充数的。

做一天小堂名，除了供给吃穿之外，每天有三百文收入。穿，是讲小堂名的服装，有的小堂名的穿戴，象《回荆州》里的刘备，下着裙子，上穿马褂，头顶珠冠，有的则如祝英台扮男装的打扮，我们这个凤鸣堂的小堂名，则是后面一种打扮。我人特别矮小，穿着戏袍腰间要用一根带子结住，才不致使下摆拖到地上，而且因为人矮，排起队来老排在最前面，好在每逢迎亲、出丧，这样的仪仗队很多，有放铙的，有打锣的，有军乐队，有打着肃静、回避牌子的，有方弼、方相，而且还不止一班，有的前前后后有几套小堂名，几套军乐队，道子可以排里把路长，沿途吹吹打打，居民夹道观看。记不起来是一家什么人家结婚，新娘的嫁妆整整摆满了东埭街和南埭街。二十年代同里富豪、官僚、地主的生活，着实奢侈。

这种迎亲、回门、出丧仪式，走路都有一定的路线。凡办喜事，一定要走过太平桥、吉利桥，取其太平吉利之意，有的还专门去兜一次富贵桥，以保其子孙的富贵。记得有一次东溪一家什么人家结婚，前前后后化了七天时间，排场之大，如不是亲眼所睹，几乎难于想象。

凤鸣堂的堂名不仅接同里本地的生意，也接外地的生意，接到外地的生意时，也把我们这班小堂名带去。通常是租用一只有的篷的船，船头上放着刻有凤鸣堂字样的两只大木箱，箱内是拆卸下来的拍曲时坐人的台，以及各种乐器，大人们在中间的舱内，我们六个小堂名，挤在前面的舱内。船的前舱没有窗，天晴时，可以从舱口看到湖面，天雨或晚上，舱门关上，舱中漆黑一团，有时碰到过九里湖、庞山湖

时，风浪大，听浪头叩击在船头上的声音，一下一下似乎都敲在大家的心上，好象随时有船破落水的危险，人人提心吊胆，不敢出声。我年纪小，特别怕，但每天三百文的收入，对于家里则不无小补，因此也只好去挣扎。因这个缘故，我幼年时期，就跑遍了这一带的小镇，吴江、盛泽、芦墟、黎里、南厍、北厍、平望、八折、震泽、周庄，都给我留下了印象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，仍带着美好的回忆。我特别欣赏吴江的那座长桥，传说有七十二个桥孔，我看到时已经没有此数了，但它一头通到城墙边，一头通向郊野，水波连天，确是壮观。1943年柳亚子先生送过我一首二十韵的长诗，其中有句云：“垂虹钓雪钟灵秀”，垂虹，就是这条长桥的名字，而钓雪是桥上的亭名。悠悠几十寒暑，不知此地的近况如何了。

每逢春节或赶庙会的时候，同里最热闹的地方，一是南观，一是北观。倘从苏州乘船到同里，南观就是同里的入口处，实际上它是隔了一条汤家桥，与西埭街相对的。观是寺观的观，这个庙供的是什么菩萨，我已记不起来，但同里人每逢春节，都要到南观去“点罗汉”，以卜一年的吉凶。南观的十八罗汉并非塑像，却是画像，人们倘是左脚跨进大殿（罗汉堂），就从左边点起，依着自己的年龄，周而复始，点到那一个罗汉，看他的喜怒哀乐，就是一年的象征了；右脚跨进大殿，就从右边数起。当然这是一种迷信，但儿时为此，也很得生民之乐。我记得那时日盼夜盼，把“点罗汉”当作一种什么大典似的。新春佳节，是这个小镇最热闹的时候。北观在南观相反的方向，东溪的后面，倘从三元桥动

身，要经过泰来桥、新填地、东溪，才可以到北观。对于幼时来说，可谓一种“长征”了。北观大于南观，它有菩萨，有戏台，门口塑的偶像中，我记得有作皂隶打扮的公差，有一个皂隶手里还牵了一匹马，有几个皂隶手里拿着打人的板子，那样子，可能是城隍庙吧。北观平常不大有人去，逢到庙会，则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，演杂技的，看西洋镜的，做海棠糕的，贩卖各种货物的货郎担，摆满了道路的两旁。这些东西好象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，把北观的空气也搞得沸腾起来了。不知北观还在不在，那个戏台还在不在，尚在，看来是一个应保护的古代建筑。

在去北观的路上，和东溪隔河相对，有一个陈家牌楼，那里确实有一个石牌坊，规模很大，好象有五开间的样子，牌坊后面都是大房子。同里的房子不少同苏州一样，从外表看起来，非常一般，常常是四扇门或六扇门的墙门间，但一到里边，却曲径通幽，一个厅接着一个厅，楼台亭阁，华丽堂皇。有的房子进门是一条长长黑黑的弄堂，常常会伸手不见五指，但沿着弄堂前进，过一段路一个侧门，侧门里头是一个世界，或一房家族。陈家牌坊的房子就是属于后面的这一种形式。我有一次到陈家牌坊的一家人家去做小堂名，有人告诉我，这个陈家牌坊就是弹词《珍珠塔》中方卿见姑娘的地方，因为这是当年陈御史の府邸，而弹词中提到的九松林、白云庵，都在这附近一带，至于邱六桥当塔的地方，也在同里。我当时也似懂非懂，不过同里的书场多，典当多，却是事实。至于典当，由于我生于贫穷，常常代替大人去同他们打交道。典当的柜台特别高，我踮起脚尖把东西送上



去，还要劳掌柜先生的驾，把手伸到柜台外面来接过去，真是仰之弥高。后来我才懂得，这个很富庶的小镇，倒是很能反映两极分化的特点，它有嫁妆摆满了两条街的新嫁娘，也有靠典质维持最低生活的市民；它有结一次婚摆七天排场的大户，也有为了三百文放弃学业的小堂名。可惜那时我实在懂得太少，倘不然，详细记录下来，倒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最好实录。

对于同里的特产，我印象最深的是鸡头。

鸡头的学名叫“芡”，是一个浮于水面的睡莲科植物，种子就是“芡实”。同里四周皆大湖，“芡”是湖中随处可生长的，同里的平民百姓，几乎家家把剪鸡头当作副业，特别是冬天，在小街小巷，几乎到处可看到人们手里端着一个竹制的盘子，坐在太阳底下剪鸡头。

剪鸡头用的工具，是一种特制的阔嘴、长柄的剪刀，它既要把鸡头外面的硬壳剪开，又不能损坏鸡头的肉，这要有一点熟练的技巧，因此内行不内行，速度大有悬殊。一般剪出来的鸡头，三分之一白色，三分之二裹着一层红衣，剪出之后，还要把它煮熟，然后盛在白布袋中搓，把那层红衣搓掉，洗净、晒干，才能卖给收购的地方，每月的收入极微，以此作为副业还可以，倘要靠此为生，那是办不到的。

同里有不少南货店、糖果店，东埭街的鱼行弄对面，有一家同泰兴南货店，兼售糖果，他们自制的一种“栗酥”，又香又脆，好吃极了，我幼时对此有极大兴趣，离开同里之后，仍念念不忘。还有东埭和北埭的转角处，有一家第一楼茶馆，附设在里边的卖生煎馒头和蟹壳黄的，也好吃极了，